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十八輯

(內部發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十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中华书局出版

一九七九年·北京

文史資料選輯

辛勤的培育 亲切的关怀

——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坚持

无产阶级干部路线的伟大革命实践 ……王首道(5)

回忆陈潭秋 ……包惠僧(28)

赵世炎生平史料 ……(36)

幼年时期(一九〇一年——一九一五年夏) ……(36)

中学时期(一九一五年秋——一九二〇年春) ……(39)

留法勤工俭学和苏联学习时期(一九二〇年五月

——一九二四年七月) ……(49)

在中国北方活动时期(一九二四年秋——一九二六

年夏) ……(74)

在江浙地区活动时期(一九二六年五月——一九二

七年七月) ……(101)

回忆张太雷 ……包惠僧(164)

一、在上海的初次会见 ……(164)

二、在武汉重逢 ……(166)

三、在广州的三年 ……(168)

四、在武汉政府时期 ……(171)

毛泽覃 ……湖南师范学院政史系(174)

一、茁壮成长 ……(174)

實事求是

一
來

一九七九年一月
总第五十八辑 目 录

二、烈火红心·····	(179)
三、奔向井冈·····	(186)
四、乔林播火·····	(189)
五、泉江春雷·····	(197)
六、会师前后·····	(202)
七、踏遍青山·····	(207)
八、斩断魔手·····	(211)
九、勇战逆流·····	(215)
十、红星不灭·····	(222)
张子清生平·····	蒋 杰整理 (227)

辛勤的培育 亲切的关怀

——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坚持无产阶级干部路线的伟大革命实践

王 首 道

延安，是全中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这里曾经是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本营。在这里的十三个峥嵘岁月中，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日夜操劳，领导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航向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个时期内，我大部分时间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有不少机会直接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诲。回想毛泽东同志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如在眼前。这里，只就毛泽东同志坚持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和政策的伟大革命实践，作些片断的回忆。

毛泽东同志坚持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把革命干部作为党的宝贵财富。毛泽东同志处理干部问题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热情关怀严格要求的态度、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作风、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由于有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才能哺育出一大批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革命干部，也才能使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毛泽东同志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仅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而且制定了一条与正确的政治路线相适应的干部路线和一整套干部政策。在我党历史上的每次危急关头，都是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力挽狂澜，使革命转败为胜，使局势转危为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党中央、毛主席正确处理刘志丹等同志案件，纠正了错误的肃反路线，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就是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一次。

一九三一年开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那时，钦差大臣满天飞，所到之处，疯狂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他们打着“反右”、“肃反”的旗号，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照搬苏联“格别乌”那套，大搞肃反神秘化、扩大化，造成“保卫局”凌驾于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之上的反常现象。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丧失殆尽，全国的红色根据地丧失了百分之九十。我党剩下的唯一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区也深受其害。党中央、毛主席

长征到达陕北之前的几个月里，王明路线当时在陕北的执行者把刘志丹等许多革命干部打成“右派”、“反革命”，投入监狱，搞得人人自危。加上蒋介石的重兵“围剿”和隐藏的阶级敌人乘机破坏，眼看这块根据地也有被葬送的危险。就在这危急关头，党中央、毛主席来到了陕北，给陕北军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在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干部路线指引下，挽救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革命干部，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从而使陕北成为党中央、毛主席长征胜利结束后的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党我军又从这里出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正当毛泽东同志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许多干部和群众向毛泽东同志反映了一个严重的情况：一个多月前，刘志丹、杨森、杨奇等大批陕北根据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党中央、毛主席正确处理。毛泽东同志仔细地倾听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反映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毛泽东同志对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当时，我在国家保卫局工作。由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部署直罗镇战役，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

免进一步恶化。我们出发前，毛泽东同志在下寺湾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直接审理刘志丹等同志案件的是戴季英。他是陕甘边区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边区保卫局局长。我们一到瓦窑堡，戴季英就拿出许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代表中央审阅了这些案卷，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据我们调查了解，刘志丹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党派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八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陕西渭南、华县的武装暴动，即“渭华起义”，后来又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刘志丹同志曾先后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职务。他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在他和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使这块根据地迅速得到发展和巩固。一九三五年九月，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同志与徐海东等同志共同指挥作战，在甘泉的劳山、鄜县（即现在的富县）的榆林桥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和四个营，给“围剿”根据地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从刘志丹同志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他是一个一贯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

员。象这样一位同志，怎能说成是“右派”、“反革命”呢？

我们又了解到，刘志丹同志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走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对他所住过的村子有多少人家、多少窑洞、多少大锅，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处处关心群众生活，不管斗争多么艰苦，总是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他在陕北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千方百计地给“老刘”的部队以支持和掩护。正因为有了这种鱼水相依的关系，陕北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巩固起来。我们一到陕北，就听到了当地流传的一首民歌：

“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这首民歌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对刘志丹同志的高度信任和无比热爱。一个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又怎能是“右派”和“反革命”呢？

我们又进一步调查了刘志丹同志被捕的经过。那是在九月下旬的一天，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红十五军团的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刘志丹同志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同志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他把信退给通讯员，并说：“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然后，又叫自己的警卫员和通讯员一起回部队去，他一个人前往瓦窑堡。一到瓦窑堡，他就被戴季英逮捕了。这里，刘志丹同志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的气概。

同干部本人谈话是了解干部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刘志丹同志被捕时，戴季英却没有让他说一句话，就将他关押起来了。我们按

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亲自访问了刘志丹同志。他是“首犯”，带着手铐，还钉了脚镣。他说：“我承认在我们的工作中有错误，组织上对这些错误进行审查是应该的。我们搞了这块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由于没有经验，又缺少革命理论，与上级通讯联系也非常困难，得不到中央的直接领导，在工作中肯定会犯错误。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刘志丹同志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而是一心想着党的事业，对党中央充满着无限热爱和坚定信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质。

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革命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起来呢？对于这些问题，戴季英一个也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我们根据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调查了解到的大量材料，认为他们搞的那些案卷中列举的刘志丹同志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搯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轻易冒险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中的爱国人士和不反对革命的人，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我们还陆续审查了几个所谓“犯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时候，他们也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那些“口供”，

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都是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所造成的假口供。

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来到了瓦窑堡。我们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先后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我们的看法,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对这些同志应予立即释放,恢复领导工作。同时,为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对戴季英给予最后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同志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被彻底平反的消息传出以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刘志丹同志出狱后,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切地接见了 他,询问了他的健康情况和工作情况。毛泽东同志对刘志丹同志说:你受委屈了!不过,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周恩来同志也风趣地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呢!毛泽东同志接着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同志听了,心情十分激动。他向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详细汇报了陕北的工作,并表示要跟着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坚持革命到底。

不久,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任命刘志丹同志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一九三六年初,刘志丹同志奉党中央的命令,率军渡过黄河东征,取得了许多战斗的

胜利。四月中旬，在山西三交镇的一次战斗中，他不幸中弹牺牲，为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的宝贵生命。

刘志丹同志牺牲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和广大军民深感悲痛。当志丹同志的灵柩运回瓦窑堡时，周恩来同志亲自扶柩送葬。毛泽东同志亲自向志丹同志的家属表示慰问。一九四三年，刘志丹同志壮烈牺牲七周年时，党和人民把他的遗骨迁回志丹县（原保安县）修建陵墓。毛泽东同志亲笔题了“刘志丹将军墓”的墓碑，写了一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碑石，还作了题词：“我到陕北，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是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的。”周恩来同志也亲自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题了词，对刘志丹同志表示深切的悼念，给予高度的评价。

二

在干部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从团结全党出发，搞五湖四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当时我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曾经产生过许多“山头”。这些“山头”在革命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要把各个“山头”的力量都团结在党的周围。当时，在延安，就有来自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干部，有来自一、二、四方面军以及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干部，有来自白区地下党的干部，有各条战线的干部，还有当地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等等。尽管他们的斗争历史、工作经历、爱好特长、生活习惯都各不相同，但毛泽东同志总是强调指出：

他们都为革命作出了贡献,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要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的山头主义,在承认“山头”存在中团结“山头”并逐步削弱和消灭“山头”,使全党变成一体。因此,毛泽东同志对这些干部总是一视同仁,使他们各称其位,人尽其才。同时,毛泽东同志又不断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使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

使我深受教育的一个典型事例,是毛泽东同志对红四方面军问题的英明决定和正确处理。红四方面军是我们党领导下一支英雄的革命队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张国焘在长征途中一度篡夺了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推行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公然对抗毛泽东同志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大搞军阀主义和惩办主义,残酷打击迫害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大肆残害知识分子干部,把红四方面军作为实现他个人野心的工具,使红四方面军遭到了惨重的损失,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红四方面军有极少数干部受张国焘的欺骗和蒙蔽,对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认识不清,对中央解决张国焘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理解不足,有的甚至同情和支持张国焘。这时,有的人以个别代替一般,错误地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都是不可信任的,主张对他们进行无情斗争,甚至企图用武力解决红四方面军的前线指挥部,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制止了种种错误的主张,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是党领导的部队,不是某个人的队伍;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是党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好的,是英勇顽强的,以往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搞机会主

义路线所造成的结果。要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别开来。毛泽东同志还亲切地接见了红四方面军的负责干部,找他们谈话,帮助他们认识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及其危害,号召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以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象一个人一样,都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为了使全党全军对这次路线斗争有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一九三七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清算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并指出:中央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的欣慰。”强调“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由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采取了英明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极大地团结和争取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彻底地孤立了张国焘以至后来他叛党逃跑时,连警卫员也没有跟他走。毛泽东同志对张国焘问题的处理,是我们正确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团结绝大多数同志的极其光辉的范例。

毛泽东同志“任人唯贤”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对广大干部爱护备至的崇高风格,与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部路线针锋相对。不论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是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干部问题上都搞的是宗派主义。他们自立门户,结党营私,亲一部分,疏一部分,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和

迫害，千方百计置之于死地。毛泽东同志对于他们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刻地批判了宗派主义。谆谆教导我们，不但要善于识别干部、使用干部，还要善于爱护干部、培养和提高干部；不但要关心党内的干部，还要关心党外的干部。在会上，毛泽东同志还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迫害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位同志，以及肖劲光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就在这次会后不久，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那是一九三八年农历的除夕，毛泽东同志盛情邀请张启龙、谭余保同志和我到他家里作客。当我们高兴地走进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的窑洞时，他立即放下工作，同我们亲切地握手，请我们坐下。毛泽东同志关切地询问了我们的近况之后，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忘了把湘赣苏区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把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我们一听，原来毛泽东同志找我们来是为这桩事啊！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听说，毛泽东同志在全会闭幕后曾经同当时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说，在会上忘记把张启龙同志的平反问题也讲一下。今天，毛泽东同志又专门找我们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怎能不感到无比高兴呢！湘赣苏区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毛泽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和湘赣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一道，做了许多工作，使根据地有了较大发展，苏维埃政权比较巩固。但后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湘赣苏区，我们在工作中也犯过一些“左”的错误，苏维埃政权里面也混进了个别坏人。当省委对这些问题已经发现并正在纠正的时候，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陈洪时、刘士杰来了。他们全盘否定湘赣

苏区过去的成绩和正确做法，一概诬指为“右倾保守”、“富农路线”，还大抓 AB 团，搞肃反扩大化，把一大批工作积极、忠实勇敢的省委、县委领导干部都当成“右倾机会主义”、AB 团抓起来，关进保卫部门进行残酷的斗争和迫害。安源工人出身的湘赣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同志、省委常委刘其凡同志等一批负责干部，都被他们无辜地秘密杀害了。张启龙同志和我则被打成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残酷迫害。他们撤销了我的湘赣省委书记的职务，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对张启龙同志的处分更为严重，撤销了他的湘赣军区总指挥、省苏维埃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务，开除党籍，召开公审大会，还判处了一年零二个月的徒刑。直到遵义会议以后，第二方面军党委才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恢复了张启龙同志的党籍，一九三七年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又亲自批准把他调到延安。后来，中央组织部正式决定撤销湘赣省委对他的处分。本来，事情到此也可以说是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还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上，特地抽出时间接见我们。对于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我们无比激动地说：“主席，我们在湘赣苏区的工作是有错误的，但我们是犯了‘左’的错误，而不是他们批判的‘右’的错误，我们是‘左’了！”毛泽东同志听了，微笑地点头说：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是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中央替你们平反了。接着，毛泽东同志又询问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湘赣苏区的祸害，我们都一一作了汇报。当我们谈到还有许多同志被错误路线打击、诬陷、杀害，未得到平反时，毛泽东同志指示说：你们提出一个名单来，凡是过去搞错了的、杀错了的，都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听着，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后来，中央秘书处